

刘亚猛著

追求象征的力量



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





刘亚猛著

追求象征的力量

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刘亚猛
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1
ISBN 7-108-02168-4

I. 追… II. 刘… III. 修辞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H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603 号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9.25
字 数 221 千字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前 言

大约 16 年前，在我接受美国南加州大学提供的研究奖学金（fellowship）并开始在其英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后不久，导师们要我就以文学或以（西方）修辞学作为自己的主修方向做一抉择。南加州大学英文系这两个学科的师资力量都很强，学术声誉也都很高。出国之前，我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国内自己培养的首批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的一员，一向以美国文学为专业，对文学比较熟悉。然而出于一系列考虑，我最终却选择了修辞专业。

修辞是当时西方学术界流行的概念之一。由于西方传统修辞思想强调事态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以“可信的意见”——而不是确定无误的“真知”——作为自己的推理基础，并且从来不认为超越具体语境、目的和受众的逻辑性，是论辩应该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它成了当时风头正健，以揭露、批判现代主义深埋不露的智力根基为己任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觉得特别有用的一个范畴。从修辞的角度重新审视、解读、构筑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思想基础，成了西方当代学术发展的一个前锋。甚至连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文论课上使用的教材（如广为采用的特里·依格顿的《文学理

论入门》^①都在号召将“文学批评”正名为“修辞批评”。当时的西方文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所谓的“理论时代”。传统的以了解、修正文学发展的主流叙事以及鉴赏和解读经典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正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诸如有关文学发展的主流叙事究竟是在哪些权力因素的影响下构筑起来的，文学经典是如何形成的，已形成的经典究竟服务于哪些政治、意识形态利益，文本的本质是什么，意义是怎样生成的等深奥理论问题成了这一领域学者的中心兴趣。在这个大转折的过程中，文学研究传统观点和方法的“修辞化”成为诸如保罗·德曼（Paul de Man）以及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等理论旗手们大力提倡并积极示范的一个要务。

然而，修辞作为一个学科当时正享有的学术“时髦”并非促使我选择它的主要原因。我从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来到美国这个神交已久、原来自以为十分熟悉的国度，首先最强烈感受到的不是所谓“文化冲击”，而是一种“修辞冲击”。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围绕着“伊朗—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事件^②正以唇枪舌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大交锋。各级政府选举时，候选人的激烈辩论，通过报纸、电台、电视铺天盖地地冲着你过来，想躲也躲不了。从发表于媒体上的各种评论、讨论、争论，到大学、研究生课堂上日复一日不同观点的“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式的鸣放交接，这些日常的所见所闻不能不使我在穷于应付各种言论的“饱和攻击”之际，马上直观地得出美国社会的运作不可须臾无修辞的结论。尤其使我惊讶赞叹的是这个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修辞水平。从我的房东、邻居

^①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②即所谓“the Iran-Contra scandal”。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里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班子违法私下出售武器给伊朗，再用销售武器所得款项非法秘密地资助尼加拉瓜右翼反政府武装。1986—1987年间东窗事发，所造成的政治风暴一开始大有演变成另外一个“水门事件”之势。

以及日常接触到的普通老百姓，到各机构职员尤其是商业推销员，从校园里的一般学生，到各行各业尤其是政治、新闻、教育学术等部门的职业人士，几乎所有我交谈过或直接观察到的人似乎都能不假思索、不费气力地按照交流的场合、受众、目的所提出的具体要求侃侃而谈。其口才之出色、话题之丰富、说理之头头是道，使我当时在叹为观止之际，不能不对美国社会究竟如何造就这些大大小小的“雄辩家”感到十分好奇。因此，深入了解美国的“论辩文化”、“修辞传统”，乃至支撑、滋养着这一文化传统的各种正规的或不那么正规的修辞教育，成了我极大的乐趣。

进一步使我对修辞难舍难分的是，它作为一个概念的模糊性（fuzziness）、吊诡性（paradoxicality）、争议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科因此而具有的挑战性。出国之前，我一向对我国外语学术界对“rhetoric”的通常理解深信不疑，认为就跟它的中文对等词“修辞”一样，“rhetoric”也是致力于探讨如何更准确、更有效、更生动地表达（显然通过其他途径产生的）思想，尤其侧重于对修辞格的认定、分类以及对各种辞格的功用的观察、分析、研究。到美国不久，我就发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在当代美国话语中流通的“rhetoric”一词与在当代中国话语中流通的“修辞”一词所代表的是大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和两种实践，将两者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和误译。而消除这一误解的最简单的办法，也许是将“rhetoric”翻译成有别于“修辞”而又以中文话语所理解的“修辞”为参照或标准意义的“西方修辞”。^①西方话语传统赋予“rhetoric”的任务不仅仅是研究如何更好地表达先已存在的（pre-existent）思想，而首先是研究如何根据面临的“修辞形势”产生、发掘、构筑和确定恰当的话

^①下文除非另有说明，凡提到“修辞”的地方一般都指“rhetoric”，即“西方修辞”。

题、念头、主意、论点，也就是说，产生和确定按语境要求“该说的话”或该表达的思想。在西方修辞学家看来，产生并游离于具体语境之外，修辞完全没有染指，因而浑然无雕饰的“纯思想”从来就不曾存在。任何念头或想法的萌发都意味着修辞的参与并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传统西方修辞的五大“部门”^①以“修辞发明”为首不是没有来由的。

另一方面，对修辞格的讨论仅仅是出于对这五个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即“文采”或“言语风格”的一个兴趣。将对辞格的关注等同于修辞研究本身所犯的~~错误~~应该不是一句“见树不见林”可以了得的，而简直就是“见叶不见林”。^②当然，造成这一误解的责任并不全在中国外语界——甚至可以说主要不在中国外语界。西方对“rhetoric”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发展。从18世纪以来，修辞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其在传统上所拥有的广阔领域和众多下属部门就由于“改号”的“改号”、“独立”的“独立”、“割据”的“割据”、“兼并”的“兼并”而不断地缩小。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仍然打着“rhetoric”旗号的学术部门所“管辖”的似乎也就是文体学，尤其是辞格学范围内的那一小块“领地”。然而，正如我在本书第一章即将讨论到的，西方修辞学科领域的这种大面积缩小，并不等于“rhetoric”这一概念通过其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形成的内涵和外延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甚至也不等于西方对修辞的研究发生了任何事实上的收缩。相反，以各种名义和名目进行的这一研究，一直处于扩张状态，从来就不曾只局限于文体学和辞

①这五个部门或分支包括修辞发明（invention）、谋篇（disposition）、文采（elocution）、记忆（memorization）和发表（delivery）。

②这是当代西方修辞学界的主流观点。然而不少名家在一个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对修辞格与修辞的关系提出了与此截然不同的看法。详见本书第五章的讨论。

格学的狭小空间内。

虽然一直到20世纪中叶，由于文学批评、语言学等脱胎于传统修辞研究的新“显学”以及修辞学的老牌竞争对手哲学等领域的学者众口一词，西方修辞一度被普遍认为只负责文体和辞格研究。^①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风起云涌而崛起的所谓“新修辞学”，早已通过再次高高举起“修辞发明”的大旗而对西方修辞的固有“领地”重申了“主权”。到了我初到美国的80年代中期，西方学术界作为一个整体早已改变了二三十年前对修辞一度抱有的狭隘观念，开始意识到它其实无所不在。打着修辞旗号的学科和研究不仅巩固发展了自己在言语交流（speech communication）领域原有的“根据地”，在英文研究领域取得了和文学/文化研究相似的学科地位，还通过推翻以形式逻辑为理论基础的论辩范式而将论辩研究改造成自己的一个次学科。不仅如此，修辞研究还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将自己的审视目光投向了其他学科和领域。以1985年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文科学与修辞：公共事务和学术研究中语言和论辩的应用》（*The Rhetoric of the Human Sciences: Language and Argument in Scholarship and Public Affairs*）和1990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修辞轮次：研究工作中的发明与说服》（*The Rhetorical Turn: Invention and Persuasion in the Conduct of Inquiry*）为标志，修辞在西方从经济学到生物学的各个学术研究领域所起的关键作用开始受到关注和肯定。甚至连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的“科学修辞”（the rhetoric of sciences）都发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讨课题和次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接受有关学术研究产物的一个新认识，即“知识”与其说是对向

^①时至今日，西方仍有一些学者坚持这一观点，然而他们的意见并不代表西方学术界目前的主流看法。

来存在着的事实和状态的发现、披露以及“实事求是”的描述，不如说是在一系列预设或设定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由一定的部门通过修辞手段建立起来并且通过修辞手段加以认证的一种“构筑”。

然而，当我壮着胆子闯进这一领域仔细观察时，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油然而生。在修辞作为一个学科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另外一面，学者们正就如何定义修辞、如何界定其研究领域、如何确定其发展方向等大是大非的问题争论得不亦乐乎。也就是说，西方学者们一方面以“修辞”的名义纵横驰骋，开疆辟土，所向披靡；一方面却连“什么是修辞”、“修辞的研究对象包括哪一些”等最基本的问题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与思想观念上的这种高度歧异相对应的是修辞研究在机构组织上的高度分散。以修辞学家自居的学者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学术部门，以不同的学科作为自己的“活动基地”。修辞专业一般只能在并不以修辞命名的系科里找到，而修辞专业的教授往往也来自修辞之外的各种学科，他们的学术背景经常大不相同。其他学科，如哲学或语言学，当然也充满了分歧和争议。但是像修辞学这样连关系到“自我身份”的一些最起码的问题都缺乏基本共识，因而似乎完全没有“内聚性”（internal coherence）可言的学科，还找不出第二个。西方修辞的状况当时使我联想到基督教《圣经》中有关“巴别通天塔”的神话。从修辞的角度重新构筑人们对从公共领域到学术领域的各种话语的认识，尤其是对各种知识的生产条件和过程的认识，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通天塔”式的宏大工程。然而“承建”这一工程的却是来自学术界的四面八方、操不同学科“方言”、遵循不同“技术标准”、彼此难以真正沟通的许多支“工程队”。更有甚者，熙熙攘攘、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既见不到一个“总工程师”或“总调度”，也找不到一张

“蓝图”或一份“施工方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修辞学家不能像哲学家、语言学家或者政治学家那样，在一个统一的学科机构框架内，使用同一种学科语言，以同一套基本设定作为他们的共同出发点，以便有效地协调彼此的行动推进他们的共同事业？难道当代修辞学家在贸然从事上面提及的宏大“工程”时真的触犯了什么“天条”，因而像巴别通天塔的建筑者一样，注定彼此不能沟通协调？

这一个问题以及它所体现的西方修辞的吊诡性和神秘感，成为打消我在选择文学还是修辞学作为专业方向这个问题上仍有的犹豫的“最后一根稻草”。探索它的答案成了我在接下来的16年里作为西方修辞的一名非西方学生和学者的一个几乎带强迫性的追求。在美国以至西方当代修辞研究的框架内，这些答案远远谈不上是现成的或者被隐藏在什么地方，通过一定的努力可以找得到的。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当代西方修辞研究的学科或机构框架（disciplinary or institutional framework）只允许讨论有关“修辞的定义”、“修辞的研究对象”、“修辞的历史演变”等获得“授权”的“局内”问题，而将“为什么修辞学家们至今仍然为修辞的定义争论不休”，“当代修辞研究的范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它所服务的都有哪些利益”，“当代西方正规修辞教育与其修辞实践的现实有多大的相关性”，“西方修辞研究对当代跨文化修辞互动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等“局外”问题或者“超话语”（meta-discursive）^①问题，都

^① “Meta-discursive”的通行汉译“元话语”，似乎没有很准确地传达该术语在当代西方学术话语中被理解的意义。在这一复合词（以及相类似的“meta-linguistics”，“meta-ethics”等）中，“meta-”前缀表达的意义是“beyond”，“transcending”，“more comprehensive”，与“元”在汉语中通常表达的“初始”、“为首”、“主要”、“根本”等意义对不上号。前言中涉及的一些有难度的概念（包括“meta-discourse”的词根“discourse”即“话语”本身）的意义及其中文翻译（如“claim”等词的汉译）在正文中都有比较详细的注释或讨论。

排除在“合法”的探索范围或研究视野之外。如果连问题都提不得或者不能提，何从谈得上答案？我作为一个初来乍到者，在西方修辞专业涉猎后不多久就开始感觉到这一陌生的领域纵横交错地存在着各种无形的界限。教授、班上其他博士生、来访专家等，面对我提出的某些自己觉得完全合理的问题所显露出的那种夹杂着困惑、茫然、宽宏大量和同情的眼神，以及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答非所问的反应，马上使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触及了一些“不得体”的话题，或者逾越了一些没有标志却不准接近的“界限”。以培训本专业接班学者为目的的博士学位课程力图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使受培训者在不知不觉之中了解这些无形“界限”的大体走向，因而能在学科所提供的有限空间和严格界限之内，随处耕耘播种却可以对收成有合理的期待，活动自如而又不至于逾矩。事实上，是否熟悉这些从来不曾编辑印发的课题“路线图”，是区分学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基本标准之一。

我在经受了—一个具有很高学术声誉的修辞学博士专业所提供的严格训练，尤其是通过它在提供的浓郁学术环境中连续多年的耳濡目染之后，不仅对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科内部知识，总算有了大体上的领会和掌握，而且对话题或课题的“得体”或“不得体”、“有兴味”或“没有兴味”、“值得费心”或“不值得费心”等（老师们无从教也从来没有在课堂上教过）的区别，心里也相当有数了。部分地由于这一原因，我在顺利获得学位之后，马上有幸地被吸收进在五六年前自己还一无所知的一个学术行业（profession），应聘到同样誉满美国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英文系修辞专业担任正式教职。然而，即便是在我开始以“局内人”的身份投身于西方修辞的学科和学术建设之后，上面提到的那些不怎么“得体”的“局外”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没有失去它们的吸引力。岂止如此，我对学

科内情了解得越清楚，这些问题对我来说就越发显得有意义，越发值得认真探究，越发割舍不下。这也许是因为不管我对当代西方修辞话语的掌握有多么娴熟，能在多高层次上参加西方修辞学家之间的学术对话，作为一个在美国修辞学界工作的非西方“客籍”学者，我终究不是，也从来没有被真正当成是“局内人”。这一尴尬的“边界”或“边缘”身份，使得我对于把握学科用以区分“内、外”的各种机制，尤其是对让自己的学术想像穿越和超越几乎无所不在的各种隐形局限和界限，真正从外部来观察、思考、剖析自己所处的西方学术部门，有着天然的兴趣。通过经年累月的“私自”观察、思考、分析，我对西方修辞实践和当代西方修辞作为一个学科开始形成一些不那么常规的“越界”（transgressive）视角和看法。

这些跨越学科“边界”的观察角度使我得以将视线投向西方修辞研究，由于受到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框架的制约，而在自我理解上无法避免的一些盲点、死角和禁区。例如，当代修辞研究对当代西方修辞实践缺乏真正的或者说真正具有深度的描述性（descriptive）兴趣，而且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理论活动呈现出一边倒的规定性（prescriptive）倾向，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反思一下究竟是什么深层原因造成了这一倾向。又如，出于文化意识形态的需要，西方修辞研究主流很牵强地将修辞的起源和最初发展同古典民主制在古希腊的兴起紧密结合起来，并且在对修辞作为当代西方民主制的主要运行机制的表述中，不去触及可能引起对这一根本制度的疑义的任何层面。同样，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一明显问题的存在——或者更可能的是，许多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却没有人不知趣地非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不可。我一向都是利用自己的“准局内人”身份，将我那些不怎么“常规”甚或相当

“特异”的 (idiosyncratic) 视角和看法, 尽可能以受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在学术会议、私下接触以及课堂讨论时提出来, 与熟悉的同行、同事, 尤其是自己所执教和指导的西方修辞专业的美国博士生商讨、切磋, 以便排除由于我自己的非西方背景而造成的任何错误观察和理解。虽然他们的反应方式不一, 但是他们的反馈却排除了我所观察到的争议点或者所提出的问题缺乏足够的现象依据, 是我自己的文化偏见的产物, 甚至根本就是外行人的一种臆测、臆断的可能。事实上, 当有些研究生对这些“另类”问题或视角产生太多的共鸣和热情时, 倒是我自己出于导师的责任, 不能不强调它们并非是眼下在本学科受到重视的“主流”议题或“获得授权”的 (authorized) 视角这一事实, 以及另外一个附带事实, 即尽管在思想领域“另辟蹊径”、“特立独行”、不落俗套、不囿于成见是美国学术界口头上不遗余力地推崇的价值和行为准则, 透过自己所属学科的“话语共同体” (discourse community) 内形成的主流视角, 探讨受到同一个共同体“特宠” (privileged) 的当红议题, 不幸地也是美国的学术作者——尤其是那些尚未登堂入室的学科“候选人”, 以及资历尚浅、话语“资本”不足的一般学者——赢得受众、获得出版的不二法门。任何足以动摇当前的基本学术形态 (scholarly formation) 或挑战眼下“占统治地位的范式” (the reigning paradigm) 的深度自我审视和批判所得到的, 从来都只是叶公好龙式的喜好和赞许。

就我以及与我类似的少数非西方的“客籍”修辞学者而言, 由于我们在文化权威上“先天不足”, 缺乏哪怕是仅仅越“雷池”一步所需要的“资本”, 更似乎注定只能小心翼翼地在“保险”的话题领域内, 采用“保险”的研究分析方法探讨西方修辞。然而, 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后, 已经熟悉西方修辞领域的“地理走向”, 不

仅在其“辖区”内自如运行已经不是一个问題，而且还清楚地看到，在它的一根根隐形“界桩”之外，延伸着的一大片极富开发价值的新天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将自己的理论建树局限于一个被认可的、然而却日益显得褊狭的“话题和方法空间”内，因而在事实上接受一个想说的话不便说，可以大说特说的却几乎都是听起来似曾相识或看起来似乎从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成语套话的局面，对我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了。我渴望着能够得到一个机会，静下心来将自己历年来对西方修辞的独特观察、接触、经历、探索、思考的心得原原本本、自由自在地表达出来，构筑一个既深深地扎根于西方修辞的现实又真正属于自己的视角。这时，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及其外国语学院贤明的领导隔着太平洋向我热情招手，并为我提供一个理想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要求作为回报的只是希望我尽可能多地写些东西，将我所了解的西方修辞实践、学科和学术发展现状深入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我得到了一个双重良机，即不仅可以跳出西方修辞学界所默定的上述“话题/方法空间”的局限，从一个具有超越性的广阔视野对西方修辞提出不落窠臼的表述，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堂堂正正地以一个中国学者特有的敏感和兴趣来讨论观察到的现象，^①并以国内所有对西方修辞感兴趣和可能产生兴趣的同事和读者作为自己的目标受众。

我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十六七年，惟一无法改变也不愿意改变的就是自己的中国身份或者说对中国的认同。这一执著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任何意义上的“归化”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在各种

^①非西方学者在美国从事学术写作时，都必须尽量淡化自己的文化身份，或者说尽可能以西方学者的典型态度、立场、语气与受众进行交流，也就是实行修辞学界行话所说的“mushfeking”。这是由受众及语境的特殊性决定了一种正常修辞调适。它不同于某些非西方学者为了取悦西方主流文化—政治意识形态而从西方的基本认定出发，按照西方的期待和要求对自己固有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进行讨伐的那种学术取向。

场合，包括在有影响的媒体上，我虽然明知有被认定为“政治上不正确”的危险，却禁不住要公开与针对中国的各种偏见争议一番，^①甚至在进行纯属本专业的学术思考时，我也不由自主地要联想到有关中国的事物和状况。这一倾向是我的好几篇有关比较修辞、比较文化研究的文章立项和写作的原始冲动。例如，使我至今特别引以为傲的是，我在西方修辞学者中第一个提出存在着由著名学者罗伯特·T·奥利弗（Robert T. Oliver）等开创的、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为西方比较修辞（或比较交流）研究提供着观念、理论和方法的一个研究范式，并率先对这个一直不受挑战的范式进行界定、解剖和严厉批判，从而对90年代中期之后的西方比较修辞研究产生明显的影响。这篇因为得到大度的奥利弗教授本人匿名审阅、赞许和支持，而于1996年由权威的《修辞评论》（*Rhetoric Review*）发表的文章，^②源于我对当时西方关于中、西修辞传统差异最有影响的几个观点的不满。与这些观点“论理”将我的目光引向了矗立在它们的背后，为它们撑腰、“授权”的那个范式。又如，使我很有成就感的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在西方论辩学者中率先挑战一个权威的定论，即真正意义上的论辩“只发生于文化上同质的共同体内”。我提出异质体系之间事实上只要遵循“以你的道理来论证我的立场”的基本原则，就完全可以开展西方所理解的论辩，从理论上为解决全球化时代如何通过“讲道理”（而不是诉诸任何“压服”手段）来解决日益繁多的跨文化、跨宗教、跨文明争议指明了一条出路。无独有偶，我构思和撰写这篇发表于国际论辩学研究最负盛

^①例如，1999年5月19日《国际先驱论坛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的读者来信栏刊登了我的一篇评论，驳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号称“中国通”的戴维·香博（David Shambaugh）就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引起国内学生强烈反应所发表的一篇充满偏见的文章。

^②Yameng Liu,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Chinese Rhetoric: An Anatomy of a Paradigm in Comparative Rhetoric", *Rhetoric Review* 14. 2 (1996): pp. 318 - 335.

名的理论刊物《论辩》(Argumentation)上的文章^①的最初灵感,也是来自我多年来对后冷战时期牵涉到中国的一些国际争议的观察与思考。

由于自己到美国后的亲身经历,也由于自己的职业和学术兴趣,中国和西方的“话语交往”,尤其是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对外学术交流,成了我日常十分关注的事态发展之一。国内的多数学者以及一般关心中外交往的人士由于所处的观察平台不同,可能不一定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然而从美国这一当今国际社会无可争议的制高点上观看这一交往,不能不使任何认同于中国的人感到焦心、担心、甚至揪心。虽然国家在对外宣传上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及其带来的经济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极大提高,也为从事有效的对外宣传提供了所有必需的技术、资金和地缘政治条件。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西方,一般人感觉不到中国宣传的存在,更不用说感受到它的效果和冲击了。美国和西方所有受过良好教育、对国际事务保持兴趣的人士通过西方媒体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崛起。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没有听到过中国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在发言,更不用说在为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体制和发展模式做出他们听起来未必完全顺耳,却觉得言之成理的解释、辩护或宣扬。虽然在美国的中国外交人员、商务人员、留学生、新移民等人数众多,人们却感觉不到中国针对美国社会主流的所谓“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即“民间外交”)的效应或效果。国际学术界近年来虽然不断强化对中国的研究,然而在几乎所有研究领域,人们同样听不到中国学者独特的声音,感觉不到他们与众不同的视角。甚至连关于汉语言、中华

^①Yameng Liu, "Justify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 Cross-cultural Argument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Argumentation* 13.3 (1999): pp. 297-315.

文化和文学传统、中国历史这一类话题的国际话语都在事实上几乎完全是西方学术界的一言堂。^①中国不少学者对于外界人们怎样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现实和发展前景似乎并不那么在乎。他们倾向于听任他人讲述有关这些话题的“标准故事”（standard stories），未能在事关自己的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讨论中尽力争取发言权，更不用说力争起主导作用的解读权和话语权了。

造成这种“悄然无声”（voicelessness）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东西方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不在同一个数量级的综合国力，不对称的地缘权力关系，尤其是冷战遗留下来的围绕着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意识，等等。这些不利因素当然造成了不可忽视的阻力，使得中国（或任何其他类似的国家）在对外宣传或对外学术交流上“与国际接轨”的努力不容易奏效。然而它们似乎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以中国的两个近邻为例。日本与美、欧的“话语交往”并不为上述绝大多数负面因素所累，然而其成效却极为有限。由于基本上“含蓄”地听任西方按照其利益和需要对日本进行表述，什么时候要是日本与欧美之间在经贸问题上的利益冲突激化，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使日本妖魔化的那出重头戏完全可能重新上演，对此谁都不会也不应该感到吃惊。^②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马来西亚作为一个非西方的并且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和西方进行话语交往时不仅带着上面提到的许多

^①在这类话语的参与者中当然也不乏中国籍的或海外华人学者，但关键是看他们从什么角度、在什么解读框架内、代表什么利益和兴趣、以什么修辞身份和名义发言，尤其是这一发言力图达到什么修辞目的。可以十分肯定的一点是：一个可以轻易识别出来、有别于西方视角、并且使西方视角相形之下显露出其“地方性”的“中国视角”在有关中国的国际话语流通中尚未出现。

^②由于本书以“西方修辞”为研究对象，东西方话语关系或修辞关系不可避免地构成了一个重要视角。以日本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与欧美的互动为例，仅为了解明这一关系的方便，并不涉及对这些国家的地缘政治取向和表现以及国际关系现状的判断。